

地世界

“我们是问题一部分 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女孩参与信息通信技术促进性别平等的四个励志故事

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经济中,性别数字鸿沟严重影响女孩和妇女权利。为了弥合这一差距,至少需要做三件事:

促进女孩和妇女平等获得数字技术和互联网;

鼓励女孩和妇女,并向她们投资,培养她们的信息通信技术技能;

让妇女和女孩在科技领域担任领导角色。

■ 金正 编译

近日,联合国妇女署指出,世界各地的女孩都在利用创新和技术来解决问题、团结社区,并成为促进正义与平等的力量。但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妇女和女孩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经济中,性别数字鸿沟严重影响女孩和妇女权利。

为了弥合这一差距,至少需要做三件事:促进女孩和妇女平等获得数字技术和互联网;鼓励女孩和妇女,并向她们投资,培养她们的信息通信技术技能;让妇女和女孩在科技领域担任领导角色。

从在阿富汗开发开源呼吸机,到在肯尼亚反对网络暴力、在智利扩大青年活动家的声音,以及在格鲁吉亚努力结束童婚,一些女孩和年轻女性变革者正

激励着我们。

在阿富汗,开发低成本呼吸机原型

当呼吸机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而变得稀缺时,2020年,17岁的苏玛娅·法鲁齐和“阿富汗女孩机器人团队”开发了一种呼吸机原型,以支持阿富汗的医疗保健系统。

“赫拉特省前省长要求我们的团队加入到开发开源呼吸机的挑战中。我们进入市场的机会有限,没有合适的材料,有旅行限制,我们甚至没有预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教练、专家和导师的帮助下参与了比赛。”苏玛娅说,“我们设计了一个基于麻省理工学院设计的开源呼吸机。而且,我们证明,如果年轻女性有机会,她们就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和社区。”

对苏玛娅来说,支持STEM中的其他女孩并为行业平等铺平道路是当务之急。这意味着要支持和鼓励像她这样的女孩和年轻女性实现梦想和抱负。

“对年轻一代的投入很重要,因为他们是未来,他们有很多创意,可以让每个人受益。如果有人相信他们的梦想,这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她表示。

在肯尼亚,反对网络暴力

2019年,22岁的凯西·吉托当选为肯尼亚基苏木市马塞诺大学副校长。

凯西·吉托从小目睹了家庭暴力,并被告知只有某些工作和角色适合女性。当她想成为马塞诺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时,她被其他人劝阻了,因为他们认为,要想成为决策者,女性不得不提供性服务。

“这会让你失去注意力,让你觉得‘算了’吧。”凯西说,“现在,我不想再让

任何人遭受和我一样的痛苦。”

在了解到网络欺凌和基于技术的暴力侵害妇女这一全球性和日益严重的问题后,她决定直言不讳,让自己的大学成为一个更安全的空间。

“基于技术的暴力是通过技术传播的暴力和歧视,例如网络欺凌和网络攻击。”她说,人们可以隐藏在假账号和名字后面。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因为每个人都通过技术联系在一起,受众也无处不在。

现在,凯西和她的大学已经为那些遭受过网络欺凌的人建立了支持小组,并继续在他们的校园和肯尼亚西部的高中提高相关意识。

在智利,团结各地的活动家

作为联合国妇女署“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青年工作队”成员,17岁的朱丽叶·马丁内斯与来自智利各地的女孩保持联系,学习她们的经验。她从许多人那里听说,缺乏安全的网络空间,阻碍了女孩们为实现梦想而努力的步伐。

朱丽叶采取了行动。她创建了一个平台,为女孩和年轻女性创造空间和机会,将她们的才能和知识结合起来,支持社会事业。朱丽叶认为,团结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

“为了促进平等和包容,我们首先需要耐心、尊重和宽容。”她说,我们需要互相倾听,首先要明白,会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每个人的行动范围都是不同的。

朱丽叶与与她合作的许多智利女孩认识到,年轻人需要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推动力。

“正如我们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确信现在是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她表示,我

们青年不仅是未来,也是现在。

在格鲁吉亚,利用技术和数据打击童婚

由于有着8年编程经验,玛丽亚姆·隆塔泽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并开发了有关APP,打击童婚和强迫婚姻。

在很小的时候,玛丽亚姆·隆塔泽就被告知科学技术不适合女孩。这些批评并没有打消她对STEM的兴趣,反而激发了她争取两性平等的积极性。现在,她利用自己的科技技能来解决两性不平等问题。

2019年,17岁的玛丽亚姆参加了由联合国妇女署主办的一次黑客马拉松,将性别数据可视化。她和她的团队把重点放在早婚和强迫婚姻上,因为在他们的国家格鲁吉亚,早婚和强迫婚姻发生在很多女孩身上。

“以一种创新的、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性别数据,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等重要问题的认识。”玛丽亚姆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面临两性平等问题,就更容易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

玛丽亚姆的团队开发了一款APP,展示早婚是如何给女孩的职业前景制造障碍的。该款APP塑造了各种角色,代表了来自格鲁吉亚各个不同地区的年轻女孩,用户扮演童话故事中的女英雄,回答场景问题来展示自己的未来,而在很多情况下,结局并不是“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通过这个游戏,用户可以看到女孩们不同的生活场景,以及如果没有早婚和强迫婚姻,她们会怎样生活得更好。

“谈论早婚和强迫婚姻是解决问题的起点。”玛丽亚姆说,同样重要的是,向受影响的女孩——那些早婚或面临(强迫婚姻)威胁的女孩——表明她们并不孤单。

图特写

当海洋保护遇上生计

——尼日利亚“海龟妈妈”的艰难战斗



■ 新华社记者 郭骏

5月23日是世界海龟日。在尼日利亚海滨城市拉各斯的一个渔村,几名刚出海归来的渔民站在棕榈树下,一边熟练地从渔网上摘下一条条银色小鱼,一边用当地方言约鲁巴语七嘴八舌地向身旁一位蓝衣女子倾诉着什么。

蓝衣女子名叫奥耶容可·阿德格比勒,是尼日利亚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因在海龟保护方面的热忱被拉各斯沿海多个渔村居民称为“海龟妈妈”。

正在当地渔村进行海洋保护知识宣传的阿德格比勒对新华社记者说,渔民们告诉她有关海龟的情况。

阿德格比勒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尼日利亚有海龟生存。2002年,刚从拉各斯大学毕业的她前往英国参加一个海洋保护会议,一名参会人员问她尼日利亚是否有海龟,她回答说没

有,从未听说过。

2009年,她作为尼日利亚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到拉各斯莱基区一个海滩做调研时发现一个海龟壳,这才意识到尼日利亚有海龟。她和几名同事组成团队,开始研究海龟在尼日利亚的栖息状况。他们频繁出入拉各斯一些沿海渔村,吃惊地发现海龟在尼日利亚的生存状况并不理想:当地人要么把它们当成食物,要么当成敌人。

“我第一次在当地村庄看到海龟时,差点引发骚乱。它就像一头小牛,全村人计划分食这只海龟,”阿德格比勒说。她和同行同事试图劝说村民放了海龟,但村民坚持要收5万余拉(约合140美元)才肯放,这超出了阿德格比勒的承受能力,双方陷入僵持后他们受到一些年轻人威胁,最终只能作罢。

她说,一直以来当地人把海龟当成一种食物。当地渔民还与海龟有

“私人恩怨”。“海龟(在海里)会吃被渔网围住的鱼,当渔网收拢后,海龟就会大力挣扎脱困,有时会撕破渔网。”

她说,渔网对于收入微薄的渔民来说价格昂贵,是生计所依,遭到海龟破坏后肯定会十分愤怒。当地人还相信,如果出海第一网碰到海龟,就预示坏运气,当天可能会一无所获,于是只能抓回海龟作为补偿,毕竟家中还有妻儿要养活。

但种种困难没有吓住“海龟妈妈”,她继续前往各个渔村,反复告诉当地人海龟是受保护的濒危物种,猎杀海龟是违法行为。为方便开展工作,她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尼日利亚海洋和海岸保护协会,通过举办清理海滩垃圾等活动提升民众海洋保护意识。

如今,阿德格比勒经常去的一些渔村只要出现海龟,她就能从当地居

▲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的一处海滩,“海龟妈妈”奥耶容可·阿德格比勒(左一)带领当地民众开展海滩垃圾清理活动。

▼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市,“海龟妈妈”奥耶容可·阿德格比勒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新华社记者 郭骏/摄



民那儿得到消息,然后通过劝说或支付少许钱物让渔民释放海龟。

今年58岁的塞贡·叶海亚是拉各斯莱基区的渔民,有着近40年捕鱼经验。他告诉新华社记者,现在他会释放被渔网困住的海龟,有时会得到一些现金补偿。“我们这里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保护海龟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能得到政府更多支持,就会有环保意识。”

阿德格比勒说,尼日利亚有着850多公里的海岸线,但迄今没有一个海洋保护区。她的梦想是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各方支持下建立尼日利亚第一个海龟保护地,使其成为提升民众环保意识的教育基地,还可发掘其旅游方面的潜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印度代表哈克在印度贾坎德邦一家儿童中心给一名儿童喂食。
儿童基金会/Prashanth Vishwanathan

■ 黄莉玲

目前,联合国系统的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和开发计划署等机构正在全力以赴向印度提供各方面的支持。领导儿基会开展这项工作的是亚斯敏·阿里·哈克。她最近在接受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采访时介绍了印度儿童当前的情况,同时谈及自己儿时的经历决定了她投身儿童事业的初衷。

亚斯敏·哈克来自孟加拉国。在2017年成为儿基会驻印度代表之前,曾在南苏丹、加纳和斯里兰卡领导过儿童基金会的紧急项目。

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过后的整整一年当中,她忘我工作,领导了儿基会在斯里兰卡的紧急救助工作。

动荡的童年经历

亚斯敏能够在紧急情况下沉着应对并发挥领导力,与她童年的经历不无关系。

亚斯敏说:“我出生在苏格兰的因弗内斯。爸爸是孟加拉国人,妈妈是英国人。”

“我母亲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以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于为空袭做好准备。

“那时是冬天,卡拉奇的冬天很冷,我们暖和的衣服都每个人堆成一堆,当听到空袭警报的时候,我们就跳下床,穿上暖和衣服,跑到我们在院子里挖好的壕沟里。

“第一次空袭过后,第二天早上,爸爸叫妈妈带我们去一个朋友那里,离开空军基地,因为那里会成为打击目标。我记得妈妈在哭泣。路上,她告诉我,如果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多年以后,我告诉她,如果有什么东西击中汽车,那不只是你一个人会被击中,我们所有人都在那儿,但是她只能接受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而不能发生在孩子身上。”

我是最大的孩子,那时候刚过11岁,我有三个弟弟,最小的4岁。”

亚斯敏拥有英国护照,她和母亲以及弟弟们撤离到英国,在外祖母家居住了一年半之后,回到西巴基斯坦和父亲团聚,但被送往了一个遣返孟加拉人的营地。

亚斯敏说:“我们在遣返营地里待了一年半,我父母用完了他们的积蓄。父亲们聚在一起,办了一所学校。我们学习了一种新的语言,各种歌曲和舞蹈,这个学校是我们的心理安全区。”

尽管那个时候,遣返营里的父母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这种情况持续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但他们坚持让营地里孩子学习。亚斯敏说,这增强了孩子们的适应力,也让孩子们更加谦卑。

亚斯敏说:“那个时候因为我妈妈是英国人,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得以来营地看望她,她也可以去图书馆。我爸爸是那种必须一直让自己很忙碌的人,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必须得用他的双手和手指。因此书籍被他视为至宝。妈妈带回书来,爸爸就抄写。他认为我们上学需要这些书。

“有时候,我们家的饭桌会变成一个小手术台,有人的脚指甲出了问题,就会在这里被拔掉……我的父母就这样保持着希望,给我们正常的生活,我想这或许是他们所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

一年半以后,亚斯敏全家回到了孟加拉国,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孟加拉国也成了亚斯敏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事业开始的地方,到现在她已经在儿基会为世界各地曾像她一样遭遇艰辛童年的儿童服务了整整24年。

在印度的儿基会代表工作

印度严重的新冠疫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影响。许多家庭承受着情感、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沉重压力。

亚斯敏表示,父母的压力必然影响孩子。

亚斯敏说:“学校已经关闭了一年多,在许多邦,网上学习也已经暂停了,因为老师们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在印度的3亿学龄儿童中,只有不到50%的人能够接受某种形式的网上教学。”

近些年来,印度的婴幼儿死亡率稳步下降,在过去10年中童婚现象减少了一半。亚斯敏担心,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都有可能随着严重的疫情而流失、发生逆转。

亚斯敏说:“贫穷家庭正在采用负面应对机制。他们让孩子们出去挣钱。为了彩礼让女儿还不到18岁就出嫁。儿童则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暴力,因为家里有很多的压力。有些孩子成了孤儿,可能失去了父母,或者是其他的照顾者……在没有新冠疫情前,我们看到各地建立了许多学习空间,孩子们可以参加各种活动,但现在由于担心病毒扩散的风险,所有这些活动都不能进行。”

亚斯敏说:“我们对年轻人开展工作,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意识到他们可以做些什么,而且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有个10岁的女孩告诉我,她们看到一个朋友没有来上学,就去找她,结果发现她的父母准备把她嫁出去。其中一位女孩就跟这个女孩的父母争辩,那个女孩的父母告诉她,这不关你的事,但是她说这就关我的事,而且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将来的事,关系到违反法律的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全世界最大的疫苗采购方,每年为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提供拯救生命的疫苗,对于免疫行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在致力于促进全球新冠疫苗公平分配的获取机制中,儿基会能够担当执行者的角色。

亚斯敏说:“我们在110天当中已经在印度注射了1.7亿剂疫苗。儿童基金会现在正在监督印度的5.3万个免疫中心,开展着印度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免疫运动。我们依赖为儿童进行免疫的经验,每年为2500万印度儿童提供免疫。”

钟观察

童年困境铸就未泯「童心」

——访儿基会印度代表亚斯敏·哈克